

重点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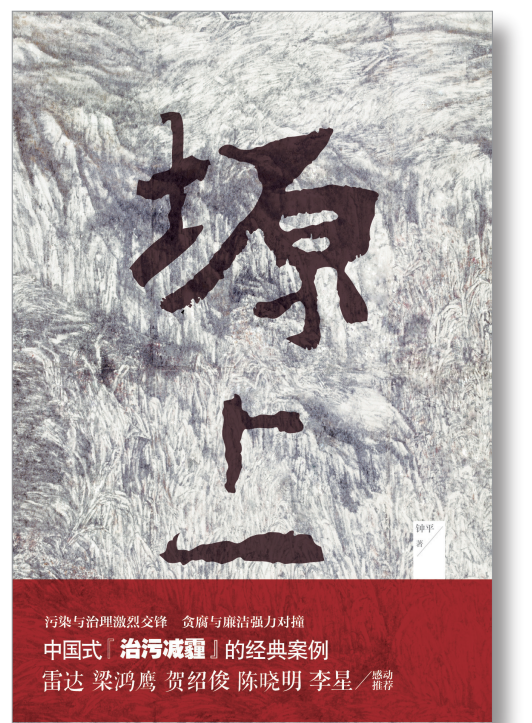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塬上》：
环保意识烛照人伦风情

■陈晓明

西北作家钟平一直关注环境保护主题,自1999年以来,他就发表了《绿色回归线》《大地诗学》《守望野性的家园》等等一系列关于生态的作品。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钟平的长篇小说《天地之间》,又是一部有着相当鲜明的环保意识的长篇小说。在生态学领域,钟平无疑是成就非凡,名声在外。最近钟平又出版长篇小说《塬上》,这是一部描写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环境冲突的小说,显示出钟平的时代意识和他驾驭长篇小说的艺术能力。

《塬上》描写了污染企业的生产状况,以及治理污染的困难,既显得十分真实,更令人触目惊心。虽然如此真相也可以从新闻报纸等途径披露,但钟平的小说描写则要深入细腻得多,产生另一种效果。恰恰是通过治理华原县的污染这个主导故事,这部小说使各色人物登台,让他们在利益、权力、欲望的选择中暴露出心理和灵魂。

这部小说的故事十分吸引人,情节紧凑,跌宕起伏。故事在几条线索上展开:有关污染治理的主导线索曲折多变;围绕污染治理、保护区建设,不同的人物关系又展开多条线索,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小说成功之处在于写了一群人物,其中多位人物形象饱满,性格充满张力。每个人物背后都有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显示出独特的韵致。固然这里面的人物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制造污染包庇污染的一群人,主要是任万能和县长刘亦然;另一方面是治理污染的原生茂、原尚武、曾智、康文、尚清、柯文等人。任万能是作者花费笔墨去描写的人物,这个人物集中表现了当今中国原始积累时期快速发展家的一批企业家。任万能对付父亲抢班夺权也不惜用非常手法,拿着一把刀子架在脖子上,从父亲手中拿来小企业的经营权。而后他到外面闯荡了一阵子,再回来办厂,迅速打开一片天地。当然,他就是污染制造的大户,只顾自己的利益,欲望无限膨胀。任万能这个人物写得富有传奇性,性格多面且有厚度。小说在他的人物关系结构中表现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对领导一套,对旧日同学一套,对女人一套,不同的女人他还有不同的手法。他对老同学尚青是一种手法,对小三杨眉是一种手法,对婆娘也有一手。婆娘杨秀女很有个性,会唱秦腔,长得丰乳肥臀,极其泼辣强悍,任万能却能对付好她,这是何等本事。杨秀女知道他有外室,大吵大闹,任万能晓之以利害,稳住婆娘。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也陷入了小三杨眉的压力。任万能一方面野心勃勃,八面玲珑,同时也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任万能身上体现出



污染与治理激烈交锋 贪腐与廉洁强力对抗
中国式「**治污减霾**」的经典案例
雷达 梁鸿鹰 贺绍俊 陈晓明 李星 雷静

西北民营企业原始积累时期的诸多特点,小说也写出工业化发展带来诸多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刘亦然则是贪腐干部的典型,但小说并不把他写得特别坏,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曾经有要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小说也写人的七情六欲,并一点点透出他的欲望膨胀,直到滑向违纪的边缘而浑然不觉。他对同雯雯的感情本来未尝不是男人对漂亮女人的正常喜爱,但任万能一步步让他们关系变得不正常。干部手中的权力伴随着欲望是怎么膨胀起来的,这部小说写出了相当真实的过程。

西北的作家擅长写历史,尤其是以家族、家庭为纽带的大历史叙事,钟平得西北文化地理积淀之便,他的小说描写家庭、家族的当不在少数。但是,钟平却始终有现实关怀,他并不一味深入西北历史文化中去,而是要透过现实问题来介入历史。对于他来说,历史经常是他叙述的背景,他的小说人物所体现出的人文伦理蕴涵,他们脚下的土地,他们置身于其中的风土人情,所有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引

入历史。这就是钟平的小说,既写现实紧急的问题,也有相当深厚的西北文化底蕴所在。

小说以原生茂为切入叙事的视点,这个构思就把塬上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传统背景交代出来,原生茂家庭作为小说结构的一个中心也被确立起来。原生茂早年经历不凡,一直做到县人大主任,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原生茂作为人物关系的背景,他把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肯定都做了恰当的定位。原尚武则表现了新一代有志于环保的干部果敢坚强的品格,他身上的正能量显得很充足。由尚青和康文则又带动起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故事的背景,尚青与康文的感情纠葛显得十分纯真,作者似乎是在重温已经消逝的爱情,这无疑也是可贵的。为这个时代的情感伦理、人与人的关系建立起一种肯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小说也写了另一种女子形象,相比较而言,同雯雯的形象就写得更为有张力。同雯雯有着美丽的外表,有着不平凡的身世,但她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积极去争取自己的机会,去拓展自己的人生道路。她大学毕业,在环保专业和管理方面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她的“情商”也很高,她能与任万能建立起恰当的工作关系,能与好色的县长刘亦然周旋,她心里却更倾向于与正派善良的柯文建立情感关系,甚至不惜以身相许。西北女子的直率伶俐,现代女子的自主与独立精神,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这个人物形象的饱满丰富和鲜明的个性,是一个能立得起来的人物。

小说中出现的朱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象征着对美丽环境的渴望,表达了小说中人物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小说因此获得了一种象征的深度。由此可见钟平在小说艺术构思方面已经有相当独到的经验。

当然,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还有再挖掘的余地,比如几个正面人物,曾智、康文和尚武,他们都可敬可亲,但总觉得人物形象有所雷同,且性格张力不够。或许是他们受到正面人物容易同质化的限制,作者又太欣赏他们,以至于他们的行为方式、语言、人生价值认同都难以显出有冲击性的个性。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有鲜明的时代责任意识,写出了当今西北地区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写出了西北生活的风土人情和现实真实,写出了一群有生活质感的人物,使这部小说立得起来,在生态文学这一领域,这部小说的影响值得期待。

《**塬上**》,钟平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新知新思

近年来抗战题材文学(主要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影视剧突然火爆起来,甚至有泛滥之势。作为军旅文学、影视剧的一部分,抗战题材因中国军民八年浴血奋战伤亡数千万成为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被作家视为可供挖掘与探索的题材富矿。然而,随着时代的久远,抗战历史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渐趋模糊与混沌,能否有效介入“抗战”那段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对处于想象彼岸的“历史存在”进行富于主体性、时代性和真实感的新鲜叙述,着实考验着当下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作伦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因观念视角及创作者的不同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意义。问题在于,近年来抗战题材文学、影视剧多数采取娱乐化的叙事策略,中国军民的正面抗战被退隐,民间立场与视角凸显,演义传统和传奇叙事得以张扬。诚然,“虚构”原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克罗齐所谓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文学艺术的“虚构”本质亦无二致,但“虚构”的前提是创作素材与创作者的经验、想象构成一种逻辑关系的真实,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而综观近年来的很多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叙事伦理的可靠性先在的缺失,娱乐化叙事策略则进一步导致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甚至完全置战争基本法则与常识于不顾的传奇故事的泛滥,读者与观众不经意间已经在捧腹大笑中解构并消费了那场可歌可泣、正义悲壮、残酷流血的战争历史。这些作品对抗战历史的“正面强攻”和正义讲述不复存在不说,甚至让人怀疑其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是否发生了畸变,进而,其叙事的合法性也颇可质疑。因此,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创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关注与思考。在如此背景下遭遇李西岳的长篇小说新作《血地》,笔者收获的是一种清新鲜活、血脉贲张且又沉郁悲壮的复杂而微妙的阅读体验。《血地》中的人物如李长生、李长在、李母、香梅、郭老财、郭文广、郭文秀、吴桂兰、铁榔头、小白鞋等,个个真实生动、气血飞扬、英雄气十足,小说的故事线索并不复杂,张扬的是人情之美和爱的力量。

《血地》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尤为出彩,

李长生、李长在和香梅,李长生、郭文广和吴桂兰,郭文秀和刘涛,铁榔头和小白鞋等几条感情线索渐次铺开,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回环往复、不疾不徐,缠绕纠结中蕴积着感人肺腑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血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亦不见对大的时代风云、历史背景以及战争场面的全景式书写,作者将视点聚焦于战争中的个体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轨迹,以富于生命痛感和情感观照的笔触构建起一个凸显作家主体性和地域风格性的独立而完整的小世界。《血地》成功地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运用浓墨重彩的叙事抒情方式及民间传奇的语言结构形式,在整体上反映出抗战历史背景中冀中军民所特有的审美意识和情感结构,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思想形态及心理轨迹,对残酷的战争大历史进行了微观重述和浪漫抒写。所谓“小叙事”,就是关乎人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背景中小细节的特写。小说通过对

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和时代的面影,甚至看到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而渺小,却因为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独特而丰富,反而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一个开阔且完整的世界。

以当下的眼光穿越时代的迷雾,重新理解并建构战争历史并非易事,重建虚构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对当代军旅作家而言,个人经验是有限的,更是碎片化的,流讹云谲的战争历史与当下和平生活之间宛若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相互映照。在当前已经模式化的抗战题材中,我们已经越发难以看到新鲜的经验与新鲜的认识。《血地》之所以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场,正是为了表现与探索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极富个人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小叙事”勾勒出来的小而完整的“经验世界”鲜活生动,气象沉实,带有作者的情感温度和认知深度,为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在新世纪的书写提供了新鲜经验与多种可能性。

《**血地**》,李西岳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书香茶座



今年夏天,一位友人给我推荐了余秋雨的一篇散文《品鉴普洱茶》。文人骚客对茶、酒或者其他民俗文化产生兴趣,撰文品评一番,本不奇怪。甚至可以说,如果文人们连这几样都没有涉猎,其文字美感或文学意趣就大大地打了折扣。所以对余秋雨欣赏茶事的文章,我是抱着简单欣赏的心情来读的。

但当读罢《品鉴普洱茶》,我的感觉几乎可以用“震惊”甚至是“折服”这两个词来形容。余秋雨对普洱茶了解之深,据说已位列行业内公认的“普洱老茶品鉴专家”,这是我此前所不知道的。而这个“专家”的名头,也并不是余秋雨自封或者其他专家“抬轿”包装而成的,而是因为他扎扎实实地拥有着对普洱茶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真正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在《品鉴普洱茶》中精妙的文字、灵动的语言,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文学之美。该文从普洱茶给初喝者形成的障碍开说,对比了普洱茶、乌龙茶、绿茶的味道,令人叹服地用“陈醇”、“透润”来形容普洱茶的口感,采用的比喻和联想更是展现了“余式散文”的华彩: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来用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遙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餐盘中轻轻诵经……

对普洱茶的介绍和品鉴,即便是停留于此,也已经可以说达到普洱茶“资深饮客”的层次了。但余秋雨没有就此停顿,而是引领读者迈进更深更广的天地。普洱茶与其他几种主要的茶叶品种的口味差别,来源于制作工艺的差别,说到底就是发酵方式的不同。作者将普洱茶的发酵称之为“微生

物美学”,接下来再转入普洱茶的历史沿革叙述。在文章的最后一节,余秋雨将普洱茶的奥秘升华地为地球局部生态未遭破坏而对人类的回馈,认为普洱茶代表着中国新文化的“生态文化”,稳健、着地、深厚、悠长。

当时我就感到,《品鉴普洱茶》这篇文章带有雅趣,反映出极致化的文字之美。阅读这样的文章,心态会很轻松、很放松,既让门外汉了解到有关普洱茶的多项常识,也能启发“资深茶客”们的领悟——但最终会让人调整到郑重审视普洱茶文化韵味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角度。后来得知余秋雨将此文收录在新出版的《极端之美》一书中。同时还有他撰写的另外两个领域——昆曲和书法的文章,以《昆曲纵论》《书法史述》分别命名,与《品鉴普洱茶》一起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新作之所以叫《极端之美》,显然因为在他看来,普洱茶、昆曲、书法都有着“极端之美”,堪称“文化极品”。什么是文化极品呢?余秋雨提出了独有性、顶级性、具体性、共知性、长续性等5项端查标准。他认为只有前述三类才符合标准,并且是“沉淀着生命的文化,是精神价值的实现方式”。

书中的《昆曲纵论》,是从元杂剧的起源说起。元杂剧的一时繁荣,是传统的文化理论很难给予解释的。蒙元统治者并不重视文化以及中原地区的千年儒学传统,这通常会被解读为文化破坏的力量。余秋雨却敏锐地意识到,文化破坏力量打破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某些越来越规范的‘超稳定结构’”,包括不利于戏剧产生的一系列机制”。昆曲产生于元杂剧之前,却是在元杂剧拓展了戏剧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后,才逐步从发源地浙江走向江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昆曲纵论》细致叙述了明代昆剧改革、昆曲扩散流行的过程。令人感慨的是,昆曲清唱如同今天的流行神曲一样,曾在明朝让全国各地各阶层乃至全民都陷入痴迷的状态;彼时的昆曲,显现出在意境、结构、呈现上的高度精妙,这正是其可以代表东方艺术和美学“极端之美”的依据。

但昆曲终于还是没落了。你恐怕会以为,余秋雨会以某种渲染甚至煽情的方式,来呼吁重新振兴昆曲吧?错了。他提出,昆曲在明代已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理由之一,“在过度的流行中……(昆曲)创作思想被流行思想严重磨损,大量的作品越来越走向公式化、老套化、规制化”,最终必然被民众所舍弃。理由之二,大量的官僚和文人沉湎于昆曲的老腔老调,借以逃避对社会危机的直面,这也是昆曲被后人称为“世纪末的颓唐之音”的原因。

有书写,才有记录,才可能为文明的传统创造前提。书法脱胎于中国文字的书写,以其造型、节奏和韵致创造了美感和意境,这正是《书法史述》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文章在——讲述中国书法历史的同时,也穿插融汇了他的美学联想。比如说到行书,“近草,谓之行草;近楷,谓之行楷。不管什么比例,两者一旦结合,便产生了奇迹。在流利明快、游丝引带的笔墨间,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风景出现了——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云出岫,那是鹤舞雁鸣,那是竹摇藤飘,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风动岸草……”这样的叙述和联想,难道不是对书法“极端之美”的极美描摹吗?

《**极端之美**》,余秋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开卷絮语

大地漫游者的精神行走

■江 飞

这是一部行走之书:在荒野中行走,在山水间行走,在记忆里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行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行走,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行走……总之,作者甲乙是一位不知疲倦而乐在其中的行走者,既用双腿丈量大地,更用文字寻求自然乃至超自然的精神应和。这位“大地漫游者”不禁让我想起那雅明笔下那个无目的地漫步于城市街头的“游手好闲者”。当然,对于甲乙而言,前工业的乡野(而非工业的现代都市)是其倾心的行走场域,而“行走”本身即是目的,是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最好方式,是获得精神安宁与超越的不二法门。我羡慕这种精神行走的姿态,正如我羡慕退休后的甲乙此刻在京城自在随意的生活。

据我所知,在甲乙的生活里,漫游和写作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这两者的相濡以沫便有了这部《鲜花地》。《鲜花地》的起点是行走的起点,是生活的起点,也是一个“人”生成的起点。七八岁时,甲乙随父母从东北走到皖南,正是这次重要的迁徙,在其内心深处打下了两块色彩各异的界碑,一头是记忆中既清晰又模糊的“大虎山”,寄托着一个少年最初的心事和想象;一头是占据记忆中的大块空间甚至挤进灵魂的“挖沟”,蕴藏着这个少年渐渐来又匆匆离去的青春和梦想,而这中间则是流年,如“远去的车”,如“昨夜之鸟”,如梦想。世事变幻,无可阻挡,而不变的才是生活的真理、人的根柢。正如《去黑山》中的那个少年,因为吃食的诱惑而独自步行前往20里外的三姑姥娘家,而当 he 终于站在三姑姥家门外的时候,却徘徊着放弃了敲门,最终“灰溜溜地走上了回大虎山的路”。这种思维逆转是颇有意味的,不是因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快意,而是因为意识深处自然而然萌腾起的一种羞耻之心。按孟子所言,“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一种人性之“端”,最本真,也最崇高,无形却充满强大的力量。这是甲乙“记忆中永恒的黑山”,又何尝不是“致良知”者规范自我的道德之“去,人性之山”?或许我们每个都在“去黑山”的途中,拼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去看一眼“那视觉中没有,也永远到达不了的山”吧。

□江 飞

很早便背负“黑山”上路的甲乙,注定比一般人更懂得大地的心声、山水的脉动、人生的况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蹚不过的河的。那个叫“大地”的地方,是大地的缩影或象征,既“和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可挽回”,又“总让我觉得它有些超乎寻常的东西”(《大地》)。“大地”意味着母体,意味着整个世界,一种超越时间和生命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地在让你贴近它的同时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你自己”,由此甲乙真正走进了大地的深处,走进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之中,亲近或融入大地成为肯定或认同自我的一种终极方式,所谓“接地气”的最本真的含义也莫过于此吧。“气”流动在大地内部,更因为人的亲近和反思而灌注于人生历程之中,甲乙在行走中所试图获得的,我想正是“踩在大地上的那种坚实圣洁的感觉”吧。

山水有灵,草木有情。因为甲乙的行走(身体的和文字的),它们更显出大地的本色和“天人合一”的某种可能。“山”是龙山、是独秀山、是冬山、是龙虎山、是朱备山,“水”是杨桥的水,是江南的雨、是鲍冲的水、是秋浦河……于我而言,它们是熟知却未曾涉足的地理名词,对于甲乙而言,它们却是浸润着生命体验的审美对象。跋山涉水需要时间,需要精力,更需要心境,只有敬畏生命、热爱自然、勇于挑战庸常生活的人,才能够在苦乐交替的跋涉过程中体味到生命的本真、自然的可敬以及生活的乐趣。很显然,在甲乙的生活和文字世界里,山水已然成为“一种精神高度,一种哲学源泉”(《攀登是对人生的延长》),而“人生是另一座山——我们不能不艰难地终生跋涉”(《冬山行》),于是,“行走”成为甲乙贴近大地、延长人生的一种行为体验、一种精神诉求:这是仁者的高度,也是智者的情怀。这情怀在《圆照寺》《龙泉寺》《白云青鸟》《风动治云山》等篇章中又融入了释者的禅意,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我最喜欢的《圆照寺》,无论是深秋的落叶溪水,还是“专注于打扫尘世中的灰垢”的意老和尚与成缘小尼,甚至那些有法号的猫和狗,都让人感受到一种“透明的温暖”,一种“内在的沉静”,一种“极致的和睦”,这种超然之境可谓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体验。

□江 飞

当然,甲乙并非只是寄情于山水,那些在行走中所遇见的每个人物,同样是其心中长存的风景。比如那个站在树上的摘橘老人(《余湾》)、那个话语不多动作沉着的老陶(《夏日龙虎山》)等等,淳朴善良的他们成为“形色大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如甲乙一样的行客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精神的快慰。仔细想想,“认识山水草木人物”或许正是“认识你自己”所必经的“悟道”的过程。古人所谓的“行万里路”,其实并不在于里程长短,而在于脚步对道路的深情,在于心对风景人物的领悟;正如“读万卷书”,并不在于翻阅书卷多少,而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思想与思想的投契。“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甲乙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也许就是如此。当然,也可能远非如此。

透过文字使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使甲乙找到了某种独特的技法平衡。比如,在极其简淡随意的画面勾勒里,总会不经意地跃出几抹动人的色彩,从西围墙的消失想到“行万里路”,冷峻地主宰着事物的沉浮与变迁”(《西围墙的砖》),从对自然的恐惧想到“死亡是在一切生命之下存在的,死亡上无止无息的美丽让我心动不已”(《我为什么当不了梭罗》),让人遐思,让人回味;又总会在“都市即景”、“浮生五味”的品赏里,生出幽默、诙谐的智慧,比如《十四区的蚊子》《给自己画像》等,这是甲乙的另一面,也是大地的另一面。正如喜剧是悲剧的另一面,“鲜花地”是“墓地”的另一面,让行走不至于因为过分劳累而陷入绝望,让精神不至于因为过分沉重而濒于崩溃:这是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必然,也未尝不是甲乙提供给自己和现代入的一种精神慰藉。

甲乙说,“文字就是作者的落叶,思想的落叶,灵智的落叶,但属它的形态可以比美自然的落叶。”(《在北方的北屋里拾掇文字(后记)》)作为默默注视他背影的同路人,我相信,日臻至境的甲乙会在行走中,往文字的筐里拾掇进更多更美的落叶,关乎自然、灵智以及思想。

《**鲜花地**》,甲乙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